

新闻研究资料

第五辑

一九八〇年

新闻研究资料

总 第 五 期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 (北京日坛路六号)
印刷者 文化部印刷厂

统一书号: 7190·003

定价: 0.80元

欢迎订阅

《农业经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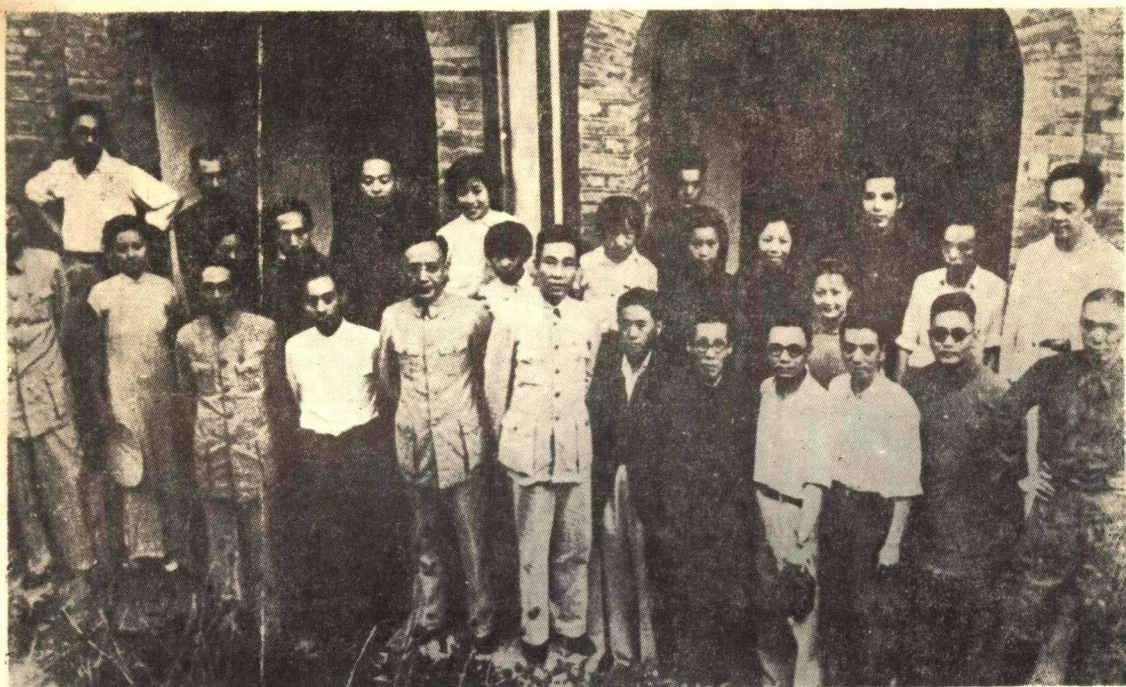
《农业经济问题》月刊是全国性的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经济理论刊物。由中国农经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辑。主要内容有:(1)发展我国农业经济的方针、政策和结构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2)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方法的探讨;(3)农村经济调查报告;(4)加速农业发展和社队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5)国外农业经济介绍;(6)农业经济基本知识等等。

本刊今年1月创刊以来,发表的重要文章有: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道路》,于光远的《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的一些问题》,杨显东的《大力开展农业经济研究工作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努力》,石山的《我国农业高速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贺致平、杨坚白的《关于改善党对集体农业领导的问题》,项南的《从当前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争论谈起》,以及孙昌、王中强、杨勛、金汶、

盛中策、任继周、侯学煜等人的文章。

本刊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办理订阅手续。代号:2-140。每期定价0.30元。





一九三八年郭沫若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摄于武汉珞珈山。前排右一田汉，右三阳翰笙，右五杜国庠，右八郭沫若，右九周恩来，后排右一胡愈之，右四邓颖超。



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郭沫若同志参加游行归来。

新 闻 研 究

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探讨戴 邦	4
有心创特色 ——浩劫前北京日报副刊二三事	陈 斯 9
邓拓同志指导我们办晚报（续）	顾 行 17

报 纸 与 读 者

报纸必须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 ——重庆新华日报的《社会服务》栏	杨润时 21
大胆，泼辣，喊出人们的心声 ——解放前柯灵主编的上海文汇报 《读者的话》	黄立文 24

革命前辈与报刊

郭老与报刊	邱沛篁 32
李大钊扶持下的西北日报	祁淑英 45
蔡和森同志主编向导周报	罗绍志 49

怀念恽逸群同志

杰出的新闻战士	于 友 53
悼念舅父恽逸群	顾雪雍 56
悼念恽逸群同志	陆 诒 59
答申报史编写组	恽逸群 62

纪念戈公振诞辰九十周年

读戈公振的遗著《英京读书记》	戈宝权	64
英京读书记	戈公振	66
英京读书记补遗	戈宝权	72
新闻名将戈公振	王凤超	76

关于大江报

詹大悲先生事略	董必武	83
革命的号角——大江报	刘望龄	88
大江报的一个著名标题 ——关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方汉奇	90

回 忆 录

爸爸王芸生的少年苦学历程	王芝瑜	92
忆和韬奋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陈象恭	98
东江纵队的前进报	钟 紫	102
回忆西方日报的战斗过程	陈 落	105
分明非梦亦非烟 ——回忆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	燕 凌	110
回忆访问叶挺将军	丁浣海	117
记抗日战争中的报纸义卖	张西洛 李廷璞	119
旧政协采访散记	汪受善	121

华 侨 报 纸

回忆缅甸中华商报	朱仲玉	128
----------------	-----	-----

广 播 史 料

播音员日记

- 解放战争年代的播音工作 齐 越 132
- 一次不寻常的广播通话 白 絮 138

报 刊 史 料

- 民报始末 陈文良 139
- 梁启超初办新民丛报时的宣传特色 何炳然 145
- 史量才接办申报初期史料 马荫良 储玉坤 153
- 中国现代化报业初创时期
- 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的报刊 潘贤模 160

世 界 新 闻 之 窗

- 美国最大的一家日报开辟第二条战线
- 曾美云译 168
- 变化中的美国报纸面貌 张黎摘译 172
- 杰克·安德逊和他的《华盛顿走马灯》专栏
- 茹 辛 173
- 日本的第一张日报——横滨每日新闻..... 邵加陵 175
- 读卖新闻打入美国市场 宁 新 171
- 丹麦最古老的贝林时报面临停刊危险..... 徐跃魁 176
- 重要启事 本 刊 20
- 来函订正 黄立文 91

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探讨

戴 邦

〔按：这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作者应河北省新闻学会邀请向河北省新闻工作者作的学术报告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我们党所领导的报纸，对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出过大力，有过重大的贡献。我们的报纸，特别是我们的党报，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曲折前进的历史中，我们的党报也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也有过惨痛的教训。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把报纸当作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时期，我们的一些报纸变了质，这是党报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教训，就是不重视理论，单凭热情和感情来进行盲目的实践，犯了好多错误，而且有些错误一犯再犯。因此，总结党报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且把它上升为理论，用来指导今后的报纸工作，以适应实现四化的需要，在目前来说特别重要，也特别迫切。

要改革报纸工作，把我们的党报办成党和人民都感到满意的报纸，首先必须把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搞清楚。我这里讲报纸，包括广播、电视、通讯社的涵义。

报纸的性质是什么

报纸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研究报纸的主要特征出发。

构成报纸的性质的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我们可以主要地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从政治上来看，一个是从业务上来看，一个是从报纸的主要手段——新闻来看。从政治上来看，古今中外的报纸，都是在阶级社会产生的，都有它的依附性，也就是说，报纸是有党派性或集团性的。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资产阶级的报纸，不论它怎样声称“超阶级”、“超党派”，怎样标榜自己“客观公正”、为“公共利益”服务，归根结蒂，它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家报纸和通讯社或者它本身是资本家的企业，或者它的后面站着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大老板。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则从来就公开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战斗武器。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也公开申明它是党和人民的

耳目喉舌。在阶级社会里，报纸的阶级性、党派性的确是它的基本属性。否认这种基本属性，想要创办出一种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党派或集团的报纸，就象是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决然不可能的。

然而，报纸的这种阶级属性，就是它的主要特征了吗？我以为还不完全。报纸，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所有这些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新闻，报纸，应归入政治的范畴，它的阶级性也是很强的，但是不论强弱的程度如何，阶级性还是属于它们的共性。共性不是主要特征。所谓特征，就是这一形式独有，而其它形式所无的东西。我们只有找到了报纸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能够互相加以区别的东西，才算找到了它的特征。

那么，报纸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这就要着重地从它们的业务特点，或者说从它们使用的主要手段上来说明了。比如说，文学艺术主要是用形象化的手段，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打动人们的思想感情，对人们起到教育作用，从而达到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目的。哲学则是用高度的概括和抽象的方法，提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人们如何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来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的。那么报纸呢？报纸是一种出版物，而且它还不同于一般刊物和书籍，也不同于布告、法令和文件，它是每日（每时）都能和最广大的读者见面的新闻纸，它能最快速最广泛地报道社会生活中一切新发生的重要事件，它能最及时最有效地影响社会上一切能够接触到它的人们的思想、情绪、观点、意志，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一句话，它是以传播新闻——传播新鲜而重要的事实为主要手段来影响人们、教育人们的一种舆论工具。这就是它的特征，或者说是它的特性，它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相区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当然，报纸上登载的东西，不只是新闻，还有社论、评论、通讯、文章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然而新闻却是第一位的东西，是报纸的基础。没有新闻，就没有报纸。报纸的言论很重要，言论也是形成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考察报纸的性能，试图给报纸下个定义的时候，一定要捉住这个特征不放，不然的话，我们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时候，就很可能要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在实践上也就很可能办出一种没有报纸特点的报纸。林彪、“四人帮”一伙，从理论上把报纸的属性绝对化，否认报纸的业务特征，正是为了愚弄人民，欺骗读者，推广其反动政治纲领服务的。在实践上，他们把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违背了报纸的特征，也违背了新闻的规律，用假话、大话、空话、绝话制造社会舆论，正是为了贩卖其反动的政治纲领，妄图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

关于报纸的任务

报纸的任务，主要是指它的报道内容而言。资产阶级报纸的内容无非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任务，是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来制定的，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党和人民的实际斗争需要来制定的。总的来说，报纸一方面要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另一方面又要把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的伟大创造、

智慧、力量、经验、意见、要求充分地反映出来，从而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者说是一条每时每刻都能息息相通的“精神导线”。

报道阶级斗争，当然是报纸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甚至是主要任务，但是它从来就不是报纸的唯一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到一定阶段，发展为冲突，形成革命，产生出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发展，可见阶级斗争只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毛主席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从这个观点来分析，把报道阶级斗争当作报纸的长时期的、唯一的任务，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我要谈一谈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说法的意见。这个说法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在前面探讨报纸的性质的时候，曾经肯定了报纸的阶级属性，如果仅仅从阶级属性上来理解，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抓住报纸的主要特征，因为所有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也同样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这个只含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定义。其次，对毛泽东同志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它是从报纸的任务来说的，并不是指报纸的性质来说的。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理解为报纸的性质，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原则，也不符合我们长期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我们党打了几十年仗，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说宣传阶级斗争是报纸的唯一任务。比如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报纸，在那样的激烈斗争中，还宣传生产运动，也还宣传民主，宣传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报纸还要用大量的篇幅，反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三三制”、根据地民主建设运动。没有整风，没有大生产，这个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取得人民的支援。特别是重庆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地区里，面对面地和国民党斗争，它的宣传内容，也不是单打一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同志，在论述报纸的任务的时候，说的内容非常广泛。列宁说：“报纸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教育和团结真正先进阶级的工具。”又说：“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列宁还说，报纸要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不依靠地主和资本家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从上面这些论述来看，列宁是把“工具”作为报纸在一定时期的宣传任务来论述的，不是指报纸的性质来说的。毛泽东同志多次为报纸的发刊写过文章，大体上有这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办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从战略上提出报纸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为《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报纸“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这也是从工作任务来说的。毛泽东同志还给《中国工人》写过发刊词，说报纸是“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也是从工作任务来说的。所以，我觉得报纸的任务，是从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例如，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那么报纸的任务也就要集中地、突出地宣传四个现代化。

所以我们说，报纸的性质和任务是两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的两个概念。我们党报的性质，就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用新闻这个手段，为革命造舆论的。如果我们把某项具体任务当作报纸的性质，要么就夸大了某项任务的作用；要么就降低了报纸的作用。把阶级斗争作为报纸的性质，既夸大了阶级斗争，也降低了报纸的作用。我们历史的经验正是如此。当着我们夸大阶级斗争作用的时候，就降低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对经济宣传就不感兴趣；就否定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就否定了“双百”方针，就窒息了人民的民主，听不到人民群众的声音。可见，把阶级斗争作为报纸的性质来说，从历史上来看，效果是不好的。

关于报纸的作用

一八四九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一文中说到：“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这是马克思对报纸所起的作用的一段很重要的论述。根据马克思这个基本论点，和我党几十年来的传统，我以为报纸的具体作用，可以概括为下面五个方面。第一，报纸是通过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来鼓舞和教育人民，指导人民从事思想理论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实际斗争。第二，报纸是传播知识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这种知识包括理论知识、生产斗争知识、科学知识、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各个方面的知识。传播知识用来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不断解放思想，消灭愚昧和落后现象。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的、文化的生活。第三，报纸要为人民兴利除弊。报纸要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特别是要揭露和打击敌人。目的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来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第四，反映人民的呼声，要求，情绪，意愿，帮助和监督报纸，帮助和监督政府和党委，来正确地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发挥我们这个报纸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的作用。第五，解答群众的疑难，帮助群众克服各种困难，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以为这五个职能就是报纸的作用，这是我们长期的传统作风。但是在十年浩劫期间，片面地理解报纸的作用，把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主要内容，否定了传播知识，否定了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否定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帮助报纸和党了解情况、沟通情况，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认为这是反对党的领导或者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当然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因为它把人民当成专政的对象。我们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全面理解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对于我们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报纸的作用，也可以说报纸的社会效果，是我们办报纸的目的。报纸的作用，和报纸的性质、任务是一致的。什么样的性质、任务，决定了什么样的作用。反之，报纸的作用，是体现报纸的性质、任务的，是检验报纸的性质、任务的重要标志。

历史经验证明，报纸的性质搞错了，它必然产生相反的作用，对社会起着破坏作用，违背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作用。

历史经验还证明，在某一个时期，为了实现某项任务，突出某些作用，是可以的，但不能任意夸大某项作用，更不能否定其他的作用。否定其他作用，或者不能全面发挥

报纸的作用，或者会影响报纸的性质、任务，甚至改变报纸的性质、任务。

由此可见，研究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对改革报纸工作，把报纸办得党和人民都很满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这个地方，顺便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报纸和军队、法庭、学校一样，都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他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还说：“承认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新闻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焦点。”我以为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特别是“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是“和军队、法庭一样的专政工具”，我看这个说法更不妥当。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报纸和法庭、军队、政府一样，那么我们的报纸当然就可以给人民下命令，我们的报纸也可以出布告，我们的报纸也可以当法庭的判决书：点到哪个人，哪个人就倒霉，打哪个人的棍子，哪个人就要下地狱；表扬哪个人、哪个人就可以上升，当官，发财。我看报纸的作用不能这样解释。报纸只能反映军队、法庭、政府作的事情，但不能直接对人民下命令。它是新闻嘛，它只能反映政府、法庭这些机构工作的情况，来保护人民的利益。在这个地方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谈报纸性质的时候，往往引用列宁一九一八年《论我们报纸的性质》这篇文章，特别是孤立地、片面地引用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叫作：“不象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从这一句话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列宁说“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觉得这是断章取义，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我看了这篇文章，我以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不是讲报纸是专政的工具的。它主要是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报纸要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提出一个社会要求。什么社会要求呢？就是报纸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我在这个地方引用他几个主要论点。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呢？第一，要“搜集、周密地考察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你看，他谈的是经济。第二，工农业“是否真有成就？究竟有哪些成就？这些成就得到证实没有？这里有没有无稽之谈、吹牛和知识分子的诺言……？成就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这些成就？”基本上还是谈的经济建设。第三，他说，“有些工厂在国有化以后仍然是散漫、涣散、肮脏、胡闹、懒惰的典型，揭发这些落后工厂的黑榜在哪里呢？”谈的是组织纪律问题，涣散的、肮脏的、落后的、胡闹的，要找些典型来揭发它。第四个论点，“要反对那些坚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继续用旧眼光看苏维埃国家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它的中心意思是要揭露坏人，说坏人它也不完全是敌人，它是讲传统习惯的。在这里，说过了四个论点以后，就批评报刊对这四种现象“默不作声”，那种“官僚式的敷衍态度”。批评了这种官僚态度之后才说，你这种报刊“不象革命报刊，不象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很清楚，列宁没有从这个当中得出结论，就是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当中，报纸的性质就变了，而且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下了这么个定义。当然这篇文章还讲了其它一些内容，但根本的精神，是少谈些政治，少发些知识分子的空议论，要接近生活，特别是要注意工农群众是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地建设新社会的，它主要是谈经济建设问题的。

以上就是我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有心创特色

——浩劫前北京日报副刊二三事

陈 斯

北京日报自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创刊，就在第三版上创办了文艺性综合副刊《文化生活》。从创刊到被砸，历时十三年，另有几个专刊，都几经兴废，多有变迁，唯《文化生活》副刊，始终坚持下来，每周出刊二、三期至四、五期。当然有几次政治运动旷日持久，整个报纸版面都被打乱了，副刊也只得暂停一时；但运动高潮一过，报纸领导人范瑾同志和周游同志就要抓副刊的恢复和改进。在全国解放后的省、市党报中，办《文化生活》这样的综合副刊，北京日报是较早的一个。

作为报纸的副刊，和整个报纸的关系，有共性，有个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这里着重研究抓特点的问题。仿照祖国民间工艺把技法的要领凝缩成几个字的口诀，本文的中心意思拟放在“有心创特色”五个字中，即：一要敢言特色，无特色不成副刊；二，特色靠创，照猫画虎不行，独创才出特色；三是要有心去创，永不满足现状，不墨守成规。希望这“五字诀”尚得要领。

多 样 化

《文化生活》副刊的性质是文艺性综合副刊，其主要特点或途径，就是多样化。这是北京日报创刊时，编委会就定下来的。在以后的不同时期，谈到副刊的方针，有时提“五性”，如思想性、文艺性、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时提“三性”，如思想性、地方性、知识性。“三性”、“五性”的内容，都常有变化，有时还强调要有“战斗性”。但不管怎么变，其中总包含着整个报纸共同的部分，如思想性、地方性等；而这些共性的东西，在副刊上，则是要通过副刊的特点来表现的，如文艺性、知识性等。想当初北京日报要办副刊，正是为了增加一个可以表现共性的特色，多一个宣传手段，增强（而不是削弱）报纸的宣传效果。离开本身的特点，副刊就不成其为副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而所谓文艺性、知识性、趣味性云云，都不象新闻、通讯、特写那样多少带点规范化的形式；综合副刊上的东西，可以具备千变万化的写作形式。所以不论提“几性”方针也好，归根到底，副刊是要多样化，即以多样化的形式，从副刊的整体上（而不是要求每一篇稿子或每一个版面）、从一段时间上（而不能要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来配合报纸的宣传方针，满足广大读者的广泛要求。

通览北京日报副刊，可以发现，我们对于副刊总是“副”，总是要配合（对于报纸

副刊是不可讳言这个字眼的)报纸宣传,是明确的。而同时,正因其为“副”,所以这个配合只能通过其本身的特点来完成,否则没有区别,何言配合?这一点,也是坚决的。

《文化生活》副刊创办之初,北京日报编委会还提出以创立多样化的栏目来保证多样化的内容。现在常用“三大件”这个语言,那时的基本栏目,也是“三大件”:杂文、群众文艺创作、影剧评介。其它栏目是经常变化的“活栏目”。生命力强的栏目多是有普遍兴趣的栏目。

有趣的是,《文化生活》副刊的第一任主编人在工作上对“三大件”有他自己一个“三之方针”：“杂文,抓紧之;群众文艺创作,照顾之;影剧评介,好自为之。”他的道理,主要在处理稿子上,因杂文涉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问题,稍有疏忽就会捅漏子,所以作为重点,要抓而紧之;而影剧本身是经过严格审查把关的,何况那时的电影主要是“老大哥”的电影,只要好话多说,多介少评,就可以放手去干了。

这件事有它的反面。“抓紧”的结果,抓过了头,久而久之,成了只抓其一,不抓其二,就往畸形发展了。杂文,按当时的理解,是批评与讽刺的武器。北京日报创刊以后,副刊上的杂文大受欢迎,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概念:副刊可以使用杂文干预生活,鞭挞丑恶,以此配合正刊。于是文化生活组便在各采访组的帮助下,整理了一批基层干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材料,类似以后的《内部参考》,发给作者,组织杂文,往往不是针对某科长,就是某主任,虽不点名,但比点名更厉害。因为不点名就可以把事实夸大,美其名曰“艺术的夸张”,“艺术的真实”;加以有些杂文语言尖刻,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另一方面,形式也发展了,从杂文到翻译苏联的讽刺小品,从中国作者仿作讽刺小品到传统形式的相声,从漫画插图到单幅漫画和连续漫画、漫画配诗……各种批评讽刺手段都出现在版面上,比重越来越大。不可否认,一时的确出现了不少有普遍针对性的作品,至今堪称脍炙人口,如杂文《乾隆遗风》,漫画《旁若无人》《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讽刺小品《周末》,相声《买猴》、《夜行记》等。这些都是文艺概括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还有暗指具体人具体事的作品,有的写得就失了节制,显得咄咄逼人,不是与人为善了;而且一种“无冕之王”的观念就在这种情况下流露出来:反正宣传手段我掌握着,就这样发出去了,你有意见,其奈我何!这样就引人反感了。同时副刊的多样化的特点,的确一度受损。后来,大跃进时搞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和人人写诗、诗画满墙,副刊也卷入了,这是另一种更可怕的(根本没人要看的)单调和枯燥。风暴过去,重整副刊,每次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副刊还是要坚持多样化,不能搞单一化。

不拘一格

话说一九五五年底,北京日报编委会重申副刊要实行多样化的方针以后,有几项大胆的尝试,可以体现出认识的深化。

其一是从一九五六年起评选当年最受欢迎的国产影片和演员。这个活动虽然始于一九五六年,但绝不是学习西方自由化。当时的确出现了一批较好的国产影片,映出后大受欢迎,最得公认的是《董存瑞》及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这个活动开展以后,读者参

加评选十分踊跃，来信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但一九五六至五八年，当选的演员和导演有的被划为右派；选举活动还偏偏离经叛道选上了香港演员吴楚帆，如此等等，不能不引起某些指责。但是，北京日报编委会在范瑾、周游同志领导下，每年都批准继续举办这项活动。文艺界、电影界对这项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一个地方报纸举办这样的活动，拿不出多少经费，全靠以文会友。郭老、老舍、田汉、夏衍、蔡楚生等同志几乎年年为当选的影片和演员题字，许多同志出席过简朴——毋宁说是寒酸的发奖仪式。直到后来《大众电影》开始举办声势浩大的“百花奖”，北京日报才停止举行这项评选活动。

其二是刊登旧体诗词。这本是彭真同志的倡议，他还指出可找陈毅和王昆仑等同志约稿。那时组织旧体诗词是很难的。旧体诗词在通常观念里还和封建二字挂着钩，要突破这个观念，头一炮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作者和诗才行。陈毅等同志的诗一时整理不出来；有些作者慨然应允了，拿来的虽是七言、五言的韵文，内容又是标语口号，编者不喜欢，更怕倒了读者对旧诗的胃口。终于出来在版面上带头的，是田汉和他的力作，他的诗够味儿，内容又好，立即得到好的反响。以后郭老也给北京日报副刊写诗，特别是每逢节日向他约稿，总是有求必应。于是，旧体诗词以至散曲，成了《文化生活》副刊上常见的形式之一。

其三，不是要多样化的版面吗？不是刊登旧体诗词吗？《文化生活》副刊上却又出现了另一个出人意外的破格行动：以一个整版篇幅刊登了贺敬之的长诗《放声歌唱》，还只是第一部分，文末注明“未完待续”。登出后，马上有人反对，说这不是报纸的任务。但终于还是分三次登完了。登完以后，报社内外公认这是难得的佳作，读者欢迎登这样的好诗，文艺界表示欣赏报纸有这样的魄力。可见，多样性是要从一段时间来看的，不能是要求每一期的题目都要达到平均数——七个还是八个。刊登长文，《文化生活》副刊掌握一个原则：“大小由之”可以，但大要有大的质量，真正象《放声歌唱》这样大破格的，只能（也只可能）偶一为之。以后刊登各类长文，有过多次，如解放后中国京剧艺术团第一次出访西欧，轰动巴黎，发表了赵枫的长篇述评《巴黎向北京微笑》；广和剧场重建揭幕时，刊登了吴祖光谈掌故的长文《三百年前旧查楼》；侧重艺术分析的长篇影评《评〈母亲〉》是分两次登完的；秦兆阳的短篇小说《县委书记》登了三期。这些尝试，有的成功，获得好评，也有的不成功，遭到批评，或没有反响。后来一度曾内定每一、两个月要发表一篇像样的短篇小说，可惜迄无建树。

其四是长篇连载。按说《文化生活》副刊即使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差不多也要隔天一期，是不适于登长篇连载的。但为了尝试，还是以各种方式选登了连载小说。《青春之歌》出版前登了选段；《六十年的变迁》是个过长的连载，读者反映有点腻了，很艰苦地才登完，江英的插图却赢得好评；出于地方色彩的考虑，选编过《古城春色》的片断；中法合拍的儿童片《风筝》映出时，请电影副导演欧阳红缨按连载要求编写了电影故事。后来，北京晚报创刊，每天固定登连载小说，日报副刊就不搞了。

此外，也有由于种种原因浅尝辄止或失败的尝试。如一九五六年范瑾同志提出，北京培养业余文艺作者的工作不如天津，要求北京日报副刊在这方面作些努力，学习天津日报办《文艺园地》的经验，也开辟一个业余文艺创作的园地。文化生活组当即派人赴

天津学习。孙犁同志介绍的经验，言简意赅，概括言之不过两点：一、培养业余作者就要有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园地；二、有了园地就要坚持，不坚持等于没有。“取经”归来，文化生活组提出自己的方案：一、北京日报应该担负一部分培养业余文艺作者的责任，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但一定要同综合副刊分开，而不能彼此代替。为此，不嫌罗嗦地明确阐述：《文化生活》副刊乃是文艺性综合副刊，而不是综合性文艺副刊。文艺创作园地要另辟专刊。二、要依靠文艺界热心的同志合办。这是天津日报的经验，他们强调孙犁同志对于坚持《文艺周刊》所起的作用。北京日报地处首都，作家云集，尤应发挥这个优越条件。三、据和文艺界一些同志初步接触，他们建议，宜按诗刊、文艺创作专刊等办若干种专刊，轮流出刊，否则很难办出特点。四、文化生活组愿在不增加人的情况下，先办起来。这个方案提出，文化生活组原以为第三点很难获编委会的批准，不料在讨论时，顺利通过，只提出了一个前提：审稿权和定稿权在编辑部，党报编辑部不能把决定权交给外界，这毫不意味不信任谁，而是由于我们是市委的机关报，要坚持党的原则。在这条原则下，编委会授权文化生活组放手去同文艺界商量合作。结果是，沙鸥参加编了诗刊《骆驼》，既登专业的也登业余的诗人的作品，意图是由专业诗人带出一批业余作者；编辑部在原来副刊的工作基础上，编一个专登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的专刊《繁星》；肖殷参加编了一个文艺评论专刊，曾拟定名《啄木鸟》，可能没定下来，出刊时未用刊名。这三个专刊，有的出了一两期，有的多几期。此外还曾在北大和卞之琳商谈过出版介绍外国文学副专刊的事，由于定稿权属谁未能达成协议而作罢。在这前后，还把原来在周末的副刊上刊登的一些娱乐性栏目集中起来，加上生活指导的内容，办了《周末俱乐部》专刊。这个在综合副刊之外，又办几个文艺专刊的举动太大了，远不是北京日报一个小小的文化生活组所能摆布得开的，当时真可谓心高、胆大、手低了；加以创刊未几，“山雨欲来”，几个专刊稀里糊涂地就被吹得无影无踪了。

雅 俗 共 赏

诗云：“雨里烟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北京日报办副刊的一个方针，是既要“雨里山村”，也要“苑中牡丹”，叫做雅俗共赏。雅俗共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呢？据文化生活组的总结，有这么几点体会：一、雅俗共赏不等于多样化。编副刊允许用“拚盘”的办法处理版面，把花色品种配搭好，任人各取所爱，但同时可能哪一篇也没有达到雅俗共赏的要求。二、雅俗共赏本质上是个质量的概念，它不仅要求版面的多样化，尤其是对一篇稿件的质量的要求；不能要求每篇稿都是雅俗共赏的，甚至不能要求每一版上都有雅俗共赏的稿件，但总要经常发表具有雅俗共赏的质量的稿子，这样的多样化才是有质量的多样化。三、这里所说的质量，又不是一般的质量，它不包含“等级”（高级或低级）的含义，曲高和寡可能质量很高，但不是雅俗共赏。四、雅俗共赏是代表读者提出的要求，而能写出雅俗共赏作品的，往往是造诣很深或十分熟悉情况因而能深入浅出的专家或专业人员。

作为举例，可以说，知识性的东西往往是雅俗共赏的，如北京日报登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十讲》，每周一次，许多青工剪贴下来不说，张爱萍将军的秘书也约好每逢

刊出这天，上班前就到报社取一张报纸，说是“首长等着看”，可见是雅俗共赏的。地方性也能雅俗共赏。如北京曲艺团演出曲剧《啼笑姻缘》时，街道上的老太太和坐小卧车来的军政官员坐在一起，一边看一边还能交谈几句，这还不是雅俗共赏？有的地方性本身也是知识性，如《文化生活》副刊发起的《北京一条街》征文以及其它北京掌故一类题目，都是有普遍兴趣的。生活辅导性的杂稿，共同兴趣是很强的，不仅实用性的部分如此，思想性的部分也如此，如《文化生活》周末的内容中，曾有两次征文，一次是《我们夫妇之间》，一次是《我和我的孩子》，读者和写稿应征者，都颇广泛，不过那时这两个课题尚未成为普遍关心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如果搁在今天，那可就“逢时”了——可见雅俗共赏又是很有时间敏感性的。

从以上这种没有形成定义的理解出发，北京日报曾就文艺评论如何作到雅俗共赏约定了以下三原则：

一、《文化生活》副刊（包括北京日报的文艺宣传）不企图指导文艺运动。报纸的指导性，主要是针对群众欣赏与阅读中提出的问题，发表辅导性、指导性、引导性的评论。对于文艺界发生的问题，比如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要加以评介，作法是把来龙去脉介绍给读者，力求客观，但也不讳言自己的倾向性。因此又形成了两个概念：这种评论（包括整个副刊也适用）是“动”的不是“静”的；副刊的倾向性可以寓于知识性（通过介绍）之中。

二、要群众性的评论，不要专家性的评论。所谓专家性的评论，是指纯学术的、纯理论的、专门研究的、学院式的（对此绝无贬义，只是说它不适于报纸的综合副刊）评论。但同时十分明确：不要专家性的评论，不是不要——相反，而是欢迎与需要专家写评论。副刊把群众对文艺（包括文艺运动、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反映、问题、要求提供给专家，组织专家撰写有针对性的评论，这是经常的任务。所谓群众性的评论，就是群众需要，又能看得懂，喜欢看，能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群众看了有所得的评论。群众写的评论不一定能达到这种要求，专家却可以写出群众性的评论，而且是（如北京日报所要求的）具有专家水平的群众性的评论。群众当然也可以写出这种水平来，但不多见。

三、尊重作者，相信读者。意谓编者切忌办报人的主观主义（即自以为是读者的代表，我所爱即读者之所爱），不可过分自信，以为只有经过自己“斧正”才有雅俗共赏可言；也不可以为读者只能接受通常的表达方式，因此把有特色的表达方式一律改成社会通常的表达方式，以为这才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文化生活》副刊组稿，凡重要一点题目，都要研究角度、选题、作者，还要了解作者的观点，就写法同作者交换意见。但是，稿子一经组来，除非在政治上、政策上、理论上重大问题要研究，一般采取尊重作者原稿的态度，不轻易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特别不能把作者的缺点及表述方法改成编辑部的观点及编辑所习惯的表述方法。凡有风格的作者，即使因风格突出而一部分读者以为怪僻，另一部分读者是会接受以至喜爱的。独特的风格（如果真是独特风格的话）常常是能雅俗共赏的。

以上这些，作起来是很难的。对于不同的评论对象，要研究出不同的评论方式。这里以书评为例。五十年代初，《牛虻》译本出版，社会上提出以什么思想教育青年读者

的问题，《文化生活》副刊就约请师范大学彭慧教授写了长篇评介文章，作者是专家，回答的是群众提出的问题，知识性很强，推荐了名著，也指导了阅读。这是一种方式。

《青春之歌》出版后，也有人提出一些问题，如作者为什么不写工农兵等，北京日报就请了小说作者杨沫，电影《青春之歌》的导演崔嵬等同志到报社座谈，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同志也参加了，大家发表意见的中心意思是，看一部作品是不是对人民有益，主要看它是否是鼓舞人向上的。座谈后，《文化生活》副刊发表了发言摘要。这又是一种方式。对小说《林海雪原》，则是开展了一场真正群众（读者）的讨论，文艺界几乎没有什么反响，最后也是以述评群众中各种不同意见为结束，不是象其它思想讨论那样请人作个“结论”。此外，《文化生活》副刊也组织“正规”的评论，如话剧《文成公主》演出，翦伯赞写了长篇剧评，电影《甲午风云》上映，吴晗写了影评，这些评论既有专家的见解，又有知识性，份量很重，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有雅俗共赏之效。

文学创作的质量与雅俗共赏的统一性更为明显。高质量的作品可以说大都是雅俗共赏的。但报纸上的副刊限于篇幅，太长的作品不能发；经常刊登的还是群众业余文艺创作，这些创作有的也是很有质量的。比如有的情节逼真，生活味儿足；有的人物活灵活现，犹如就活动在读者眼前；有的群众语言运用得当，生动而熟练；有的裁剪生活片段，颇能发人深思；有的地方性强，京味引入；有的篇幅虽小，但描写细腻，让人爱不释手；有的笔法泼辣，拨人心弦。只要有一方面的特点，就是优质产品，好的编辑是不会放过的。群众中确有这样的人材，虽然往往是只能写出一篇两篇。

从创办以来，杂文始终是雅俗共赏的栏目。但它也经历了很大变化。如前所说，一开始发表杂文，火气很大，旗帜是干预，手段是鞭挞，有时几乎是指着鼻子挖苦人，当然也确是抓到了人家的一点不是；十年以后，就通情达理多了，能体谅人了，态度温和了，提倡从知识谈起，从侧面启发，委曲婉转，娓娓谈心。前一段以为杂文可以强加于人，说得有理不由你不服；后一段才觉悟到你自认为有理，也可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了其二，也许还有其三，其四。何况思想问题，服不服不能强制，强制之下，服也是虚假的。但始终有人认为，后来的杂文终感失于太软，旗帜不够鲜明，不是真正的杂文。不管怎样，杂文谈的既是思想问题，社会现象，总是普遍关心的题目，本身就带有雅俗共赏的性质。如果杂文而不是抓的社会上普遍关心或有共同兴趣的问题，不能和读者发生思想上的共鸣与交流，缺乏共同语言，就会如投下一块石头却毫无反映，那对于作者和编者都是十分尴尬的事。

勤 于 思 变

《文化生活》副刊有一个传统，年年有总结，事事有总结。总结是为了“变”，为了“改进”。下面一段话，是它对总结的“总结”：

总结是把过去一分为二。总结的时候心中有满足也有不安。总结是积累，也是探索。比日常工作中的一时冲动，总结是冷静的，但比起冷静来，更多的又是热情；因此总结与其说是冷静的，勿宁说是清醒的。没有进取和追求，办的是例行公事，得到的是公式，而不是有用的总结。罗曼·罗兰有句话：“倘若活着不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误，